

“世遗”的权力与地方的声音

——来自武夷山的田野调查

龚 坚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当下的遗产运动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进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由地方政府实施,挟裹了话语权力、政治权威、行政力量等在内的政治运动,而作为遗产的直接创造者、传承者却常常失语。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调遗产的地方性主体与人文生态的“美美与共”。

[关键词] 世界遗产;权力;武夷山;地方民众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2010)02-0122-04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下的遗产保护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同时也把“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世界遗产”等概念推向世界各地。迄今为止,中国已有38项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其中包括25处文化遗产、4处文化与自然双遗产、8处自然遗产和1处文化景观,居世界第三位。

武夷山于1998年申报世界遗产(以下简称“世遗”),当地政府和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景区管委会”)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如投入巨额资金、拆迁村落等。1999年“申遗”成功后,在遗产保护方面也投入颇多,如成立世遗保护局;聘请专家对遗产区域进行规划,实行分级保护;“投资4.8亿元,进行世界遗产保护一期、二期工程,搬迁685户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居民,对文化遗产地和文化保护单位周边环境进行专项整治”;对景区实行智能化管理,以实现对遗产区域的封闭

管理等。但村民并不认可他们的工作。在北山村村民看来,由村集体所有的山林和田地面积约占景区的80%,而且“武夷山至今有这样完好无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都是我们北山村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成果”。他们认为,不能只有维护的义务,而无受益的权力。所以,北山村村民曾多次拦截票口、集体上访,给地方政府和景区管委会施加压力。双方的博弈与紧张关系引起了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随后,村民们获得了相应的补偿,封闭管理被延期。而事情并未就此完结,“世遗”的遗留问题、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等仍继续影响着村落社会,并在村落政治中不断显现。

不难发现,带着夺目光环的世界遗产地并非世外桃源,甚至遗产保护还出乎意料地造成遗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遗产地民众与政府以及遗产管理方关系的紧张、地方民众生存发展与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等。基于此,本文以对武夷山北山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试图在具体情境中动态地展现“世遗”与民众的互动,以及由此呈现的权力样态和影响。

* [收稿日期] 2009-11-12

[作者简介] 龚坚,女,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说明》(内部资料),2005年。

《写给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报告》(内部资料),2005年。

二、世界遗产的权力表征

近年来,中国的世界遗产在保护与管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其中以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遗产管理与地方民众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针对这些问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开发与管理进行了论述。在发展中国家,很多遗产如建筑、人类遗址、古城、博物馆等都处于当地社区中,地方民众已经成为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有助于增强遗产地的活力。在中国,遗产地社区参与的程度较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保护区缺少一种激励机制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1]。

近年来,遗产运动已经使遗产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显著变化,今天的遗产已经被打上强烈的时代烙印,是一个时代话题,也是一个具有鲜明话语特征的产物。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性语境中,遗产已经不仅仅是先辈留下的“遗留物”、“财产”,而更是具有权力化资本符号的特征,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2](PP. 25~30)}。因此,遗产的所有权具有不可让渡性,并与权力、政治、话语等密切相关。由于遗产融入了“主观的、描述的和解释的经验”^{[3](PP. 334~335)},所以遗产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权力与政治的影响。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于民族国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可的惟一的合法申报主体,是遗产的根本性的表述主体。但“国家遗产”的产生比“国家”和“遗产”的历史晚得多,属于现代国家的历史范畴和特殊的表述范式^[4]。因此,民族国家名义下的“国家遗产”已经具有政治共同体的符号内涵,也正是因为其权力与政治的彰显,时下的遗产运动具有了明显的政治表象。

从本质看,遗产是一种政治现象,而政治从来都与权力有关。因为:第一,遗产是经过选择的部分历史和过去,而历史往往是从战争的获胜者与当权者的角度来加以描述的^{[5](PP. 91~101)};第二,遗产的确认、保护与管理必定涉及授权和参与^[6];第三,遗产与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等密切相联。确切地说,“遗产是由主流群体界定的。”^{[7](P. 10)}。这体现在国家化、正统化的遗产使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合法化的历史部分,以及遗产是经过选择由“他者”来识别和确认的事实中。一般意义上的遗产或者大部分的遗产旅游都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普通

民众的生活痕迹,换言之,遗产区域内及周边的地方民众不断被他者表述和选择而处于边缘化的境地。从世界遗产看,世界遗产身份的获得与其说是遗产得以传承,毋宁说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族国家政府等主流话语以及高度政治化过程决定的结果^{[8](PP. 7~9)}。而且,遗产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它既可以反映出权力,也可以反映出冲突^{[9](P. 277)}。国际组织、民族国家与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关的遗产政策、识别遗产身份、确认遗产、施行遗产管理等方式,以强势的话语权力和所谓的“立法”把与遗产紧密相关的地方利益主体或者说遗产主体排除在外,从而引起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遗产的规划与开发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遗产区域的地方社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授权并参与到规划与开发当中,进而分享遗产旅游发展带来的益处?其实是个权力问题。可以说,本地人被排斥在决策规划过程之外的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是司空见惯^{[9](PP. 270~271)}。不过,近年来,形势正在发生转变,本地社区授权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基兰认为,在对遗产进行解说与表述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地方民众对遗产的所有权,并且应该让他们参与到遗产规划以及信息披露过程的所有环节中^{[10](PP. 95~102)}。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民众对待自然环境的一些传统做法比专家的建议更具备可持续性^{[9](P. 271)}。

三、来自地方的声音(local voice)^{[11](P. 98)}

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夷山的旅游发展迅速,当地村民纷纷投入旅游业,并从中获得丰厚的收入。而在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之后,他们则在“为国争光”的号召下搬离故土。从村民们随后的反应看,身份的转换与生活空间的变化在拆迁之后的五年内并未引发外显的不满,但在2004年3月20日《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封闭管理试运行暂行规定》颁发之后,村民们把通往景区的一条小路拦腰截断,随后又与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此毁路之举连同“政府令”在后来被村民们说成是上访的导火索,并唤醒了他们保护家园和共享遗产利益的意识。北山村村民的毁路、上访等行为是对抗强制性话语权力以及民族国家“横暴权力”^{[12](P. 57)}的表达式,是来自世界遗产地的“地方的声音”。而这一系列行为与群体性事件也出现在武陵源、黄

山等世界遗产地,并对遗产保护以及遗产地的和谐构成威胁。

(一)“申遗”与拆迁

以遗产为名的实践活动在近30年已演变成一场社会运动^[13],其带给地方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北山村因“申遗”而进行的整体拆迁及其在拆迁之后村民多次进行规模较大的上访,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遗产运动所挟裹的各种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地方社会对遗产运动、世界遗产及其挟裹的“权力”所作的反应。

对北山村村民而言,1998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当时,武夷山市政府正在举全市之力为申报世界遗产,对景区的生态环境和污染进行整治。政府依靠行政权力得以实现村落拆迁的目标,而随后景区管理的一系列变动尤其是景区的封闭式管理引发村民前后多次上访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北山村因武夷山市申报世界遗产而进行拆迁,产生的最直接后果是村民与遗产地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预示了村民与遗产管理方之间潜在的冲突。

1993年,武夷山市政府首次确定申报世界遗产,历经数年,投入巨资,动迁数千人。特别是从1998年8月开始,武夷山市以“举全市之力,作世纪之搏”的口号,对99.75平方公里的世界遗产申报区展开了全面整治建设。1999年3月底,武夷山政府总投资1.18亿元,拆迁了3个乡镇、2个农场范围内的7个行政村的404户2000余人的住宅和23个单位的公用建筑,共14万平方米,在保护区外新建安置房16万平方米;完成2000多公里的电力、广播电视、通讯线路下地;铺种绿地30多万平方米;新建15公里的环景公路,168公里的旅游公路得到有力整治;诸多文化遗迹得到整修、保护,并新建、重修了7个展馆,旅游景点的基础服务设施和环境监测站建成,全面完成整治建设任务,世界遗产申报区焕然一新。经过“世遗”专家的考察与评估,武夷山于1999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不难发现,在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北山村村民自始至终都“沉默不语”,或者说处于被他者表述的情状中。从地方政治看,普通民众在政治经济权力上的弱势,使他们无法与官方的决策相抗衡,自身的利益诉求难以实现。反之,官方、土地规划者、景区设计者、土地开发者、专家等却拥有特定权力,足以决定一个地方人群的去留^{[14](P.68)}。

就武夷山风景区的规划与开发而言,制订规划的政府、专家以及企业等,大多侧重于保护纯粹的自然环境(environment),而忽视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实际。

(二)地方的声音

因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北山村于1998年底基本实现了整体拆迁,分别被安置在景区外的小区内。从经济收入看,北山村村民出售茶业的收入和旅游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因为北山村的拆迁是缘于政府申报世界遗产,所以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北山村村民获得了相应的补偿,包括门票分红、生态公益林补偿、柴炭款等。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在2004年景区试运行封闭式管理的“政府令”以及“因农事活动使用车辆及雇工进入景区的,由户主在主次入口或卡口登记,办理临时通行证后进出;到全封闭管理区探亲访友的,可经就近卡口登记核实后直接进入”的条款后,激起了村民的不满,引发了北山村村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的直接冲突,以及连续多次的村民上访。

据了解,在景区试运行封闭式管理前夕,即村民获悉“政府令”之时,“北山村部分村民于(2004年)3月30日、31日到景区阻拦售票,冲击正常旅游秩序”,“4月份以来,北山村村民多次到武夷山市政府和南平市政府,并于9月19日、10月25日近百人两次到省政府上访”,其主要原因就是封闭式管理影响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福建省赴武夷山调研组在了解双方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为从世界遗产管理的方向看,实行封闭式管理符合遗产保护法规和规划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升景区的竞争力、整合旅游资源,而且实行封闭式管理是“双世遗”(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的通行做法,目前国内其他“双世”遗产地,如黄山、泰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都实行了封闭式管理。不过,从武夷山的实际情况出发,调研组建议推后实行封闭式管理。原因之一在于进入景区的道路较多,实行封闭式管理难度较大;而且,景区内居民较多,外迁量大,群众需求难以满足;再者,“已外迁村民的茶山和耕地仍在景区内,如实行封闭式管理,会造

肖天喜《走向世界的武夷山》(内刊),2001年出版,第216~230页。

福建省赴武夷山调研组《关于武夷山风景区山心村村民上访反映问题的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4年。

成群众生产生活的不便,进出景区易与景区管理部门发生摩擦争执,引发纠纷”。

概而言之,自2004年武夷山市政府试运行封闭式管理以来,北山村村民前后进行了多次上访,期间,他们依据国家的相关政策,通过上访实现了山林的“确权”,获得了经济上的补偿,封闭式管理被延期。但武夷山世界双遗产地内的土地、山林等资源大多由当地村落集体所有,一方面是世界遗产地,一方面又是村落集体所有的土地、山林,二者如何有机统一,不仅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而且还考验着官方与民间、遗产管理方与遗产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调,给遗产保护运动带来了巨大挑战。

三、遗产保护实践中的 文化自觉与地方参与

21世纪以来,随着公众舆论对世界遗产监督力度的加大,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相冲突的事件逐渐增多。此外,遗产保护与地方社会及地方民众的矛盾也日渐突出。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遗产运动及其挟裹的权力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和冲击。

世界遗产运动对北山村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北山村的变化足以说明遗产运动中的有些力量是有建设性的,如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些问题对于村落的影响却是破坏性的,如北山村在拆迁后,世界遗产给村民、村委会、景区管委会以及市政府遗留下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包括确权问题、村集体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等等,这些可以从毁路、上访等事件中看出端倪。还有些问题是不可预知的,如北山村的未来,村民与景区管委会、村委之间的关系将如何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对世界遗产保护实践造成何种影响,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总体看,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理念在全球的传播,现代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矛盾日趋明显。一方面,全球性遗产保护的模式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保护意识和扩大了保护范围,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掩盖了地方特质与地方经验,对多元的文化形态造成了威胁;另一方面,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语权威以及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过于强大,遗产保护的他者化现象普遍存在,地方社会往往处于失语的情状之中。一

言以蔽之,当下的遗产运动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进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由地方政府实施,挟裹了话语权力、政治权威、行政力量等在内的政治运动,而作为遗产的直接创造者、传承者却常常失语。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调遗产的地方性主体与人文生态的“美美与共”。

[参考文献]

- [1] 诸葛仁,等.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中社区参与机制的探讨[J].农村生态环境,2000,(1).
- [2]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 [3] Synnestvedt A. Who Wants to Visit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A]. Russell A. Image, Representation and Heritage [C]. New York: Springer, 2006.
- [4] 彭兆荣.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与限度[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 [5] Hall, C. M. Tourism and Politics: Policy, Power and Place [M]. Wiley, Chichester, 1994.
- [6] Marks, R.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the Contradic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Tourism in the Stone Town of Zanzibar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6, (2).
- [7] Robert Hewison. Heritage: An Interpretation [A]. David L. Uzzell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ume 1: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C]. Belhaven Press, 1989.
- [8] David Harrison. Introduction: Contested Narratives in the Domain of World Heritage [A]. D. Harrison, M. Hitchcock The Politics of World Heritage [C]. Clevedon/Buffalo/Toronto: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5.
- [9] 戴伦·J.蒂莫西·斯蒂芬·W.博伊德.遗产旅游[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 [10] Keelan, N. Maori Heritage: Visitor Man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A]. C. M. Hall, S. McArthur Heritage Management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Visitor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and Marketing [C].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1] Chambers, E. Thailand's Tourism Paradox: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as Factor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 Conserving Culture: A New Discourse on Heritage [C].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3] 彭兆荣.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J].文艺研究,2008,(2).
- [14] Mary Hufford. Conserving Culture: A New Discourse on Heritage [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责任编辑 李静丽)

福建省武夷山调研组《关于武夷山风景区山心村村民上访反映问题的调研报告》(内部资料),2004年。